



◎夏学杰

《中国货币史》是我国现代著名金融学家、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历经十年钻研的心血之作，也是中国货币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该书考订精详，分疏清晰，体系完整，自问世以来即广受学界好评，自 1954 年由群联出版社出版后，为便于今日读者学习参考，东方出版中心又于 2020 年重版改为简体。

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总的目的是为帮助理解历史。虽说本书主要谈的是货币，但是由于材料主要来源于史书或是古代作家的著作，所以这本书更像是一本解读历史之作。彭信威学识丰富，曾任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上海经济调查所副主任兼《社会经济》月刊总编辑，精通英、俄、日、法、德等多国语言。作者表示，关于货币史的著作，主要见于历代的《食货志》。比起货币理论来，这些有着上千年沉淀的史料不仅数据详尽，而且内容丰富，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完整的体系。所以，彭信威不得不在浩瀚的史料中去伪存真，大浪淘金，在各种遗存著作中寻找关于货币的蛛丝马迹。

中国货币的重量千年不变

有时，史书中也充满了各种道听途说，不能一概拿来用，还得需要不断地做比较。

彭信威认为，单是从古籍中找资料还不够，一定要研究钱币的实物。在货币变动引起物价变动的时候，尤其需要了解钱币变质的情形，才能把问题弄清楚，这时仅凭书本知识就不够了。史书中对于某一种钱的重量和成色，虽然有时也加以记载，但那只是一种标准，物价的变动往往正是因为钱币的重量、成色不合这标准。只是，这一时期的钱币离开标准重量和成色有多远，史书中就鲜有记载，即使偶尔有，也是语焉不详。例如，西汉半两钱的减重，史书只把其形容作像榆荚，称之为荚钱。但这种荚钱到底轻到什么程度，则翻烂《平准书》和《食货志》也找不出来，一定要从实物中去领会。古书中偶有的记录，往往是处于特殊情形。比如，明朝以前的记载，大部分在特殊时期，不是特别丰收时的物价，便是水旱天灾或敌兵围城绝粮时的物价。很显然，这样的物价，是很难反映出平时水平的，对于研究者来说，参考作用不大。

然而，很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货币跟中国的文字一样，具有相对稳定的传承性。中国主要钱币的重量，在长期看来，几乎稳定不变。这种情形，在别的国家是少有的。唐朝以后的铜钱，基本上是维持每文一钱的重量。比如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的开元通宝，与在光绪十五年（公元 1889 年）用机器所铸的光绪通宝的重量是相等的，历经上千年没有变动。如果从西汉五铢算起，那么货币的重量就有两千年间没有改变了。彭信威总结道：这种情形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这样大小轻重的钱币，从实践中证明是比较适当的，加上人们的崇古思想使得自命有为的统治者，总以恢复这标准为功德。更为神奇的是，西汉的五铢在清末时还有流通。这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与清末同时期的希腊虽然也用德拉克马为货币单位，但是在这些德拉克马中，绝找不出一枚亚历山大时代的德拉克马。在意大利的里拉中，也找不到恺撒时的银币。在英法等国的里拉中，也已退出市场流通了。

古代劳动人民的收入有多少

史书中记载的大都是些帝王将相之事，极少涉及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国古代普通民众的收入如何呢？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在两三千年来，并没有什么增加。农户的收入，在太平的时候，平均每户每月不过一公石米上下。在战时或凶年，连这种收入也不能维持。工人的工钱，自汉到清末，每人每月随着工作性质的不同，约可买到半公石到二三公石的大米。这实际上，就是一家的生活费用。

那么，中外百姓相比，情形又如何呢？彭信威认为，货币的购买力明确了之后，不但可以研究劳动人民的收入，生活水平，而且可以进一步比较一下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二者的消长。他初步比较的结果是，在西汉时，中国劳动人民的收入高于西方世界。欧洲在封建时期，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不如中国的劳动人民。但自 14 世纪末叶起，欧洲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就比中国劳动人民的货币收入高了。但欧洲物价也高于中国，所以欧洲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更近代的事。

还原真实的购买力

《中国货币史》还将古钱币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并重点关注了货币制度与购买力的变

化。彭信威表示，货币的购买力是货币流通的基础，只有把基础摸清楚之后，才能进行货币理论的研究，否则会流于空洞，而且容易犯错误。本书用了很大篇幅来研究货币购买力的变动问题。

日本汉学家桑原骥藏因看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宋室南渡时东南岁人不满千万缗，到淳熙末增到六千五百三十多万缗，便认为这是宋朝对外贸易发达的结果。对此，彭信威指出，这其实一大部分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这同中国史家对于唐肃宗晚年岁人的增加归功于刘晏的转运政策一样，同样是忽略货币的因素。

《清朝文献通考》说：“历代官俸以汉朝为最高，为唐宋所不及。”彭信威不同意这一判断，他认为这是因为过去史学家对古代货币的购买力和度量衡没有正确的理解，所以做出错误的判断。据他的测算，中国历代官吏的真实收入，高级官吏的官俸以北宋为最高，低级官吏以盛唐为最高，都远远高于汉朝。

彭信威是用货币的真实购买力来衡量各朝代的货币价值。汉朝三公号称万斛，但每月真实收入折合大米在西汉约为一百公石，东汉不到五十公石。盛唐时的一品大员可以拿到一百六十公石，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大概近一百八十公石。而北宋盛时的三太三少可以拿到四百公石上下。到了元代，正一品官最高时也不过一百一十公石。明朝初年也想维持一百一二十公石，但因通货膨胀，逐渐减少。到清朝，一品官的收入，最多的时候也不到四十公石。再拿低级官吏的收入来比较。汉朝的百石小官每月只可收入两三公石米，在唐朝开元时，九品官收入则在十一公石以上，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总共可在十四公石以上。北宋元丰时的承务郎每月也可以拿到十公石，甚至元朝的九品官也可以拿到十公石左右，但到了明朝洪武初年降为八公石半，清乾隆时则降至七公石。

在小说中，人们动不动就会看到书里面的人物掏出几锭银子。古时候的人们总用银子付账吗？本书认为，中国古代使用的货币主要是铜钱。金银在中国自古就是宝藏价值的工具，同时作为国际购买手段，有时也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但中国古代没有铸造金银币，也不用金银为流通手段，市面上使用的基本上都是铜钱。虽然，历代也有金银钱的铸造，但这种金银钱，只具备货币的形式，目的不是为流通。

货币制度成败不在于单位的大小轻重

货币常常被权威机构当作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在罗马帝国时期，统治者们为了满足高昂的开销，铸造了更多的货币，增加了货币的供给。与此同时，他们还削减了货币中金属的含量，使货币变得更不值钱，导致了货币贬值。罗马的历史突显了有关货币的一个道理：货币的发行者可以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而操控货币的价值。这种方法，在中国古代，也常被应用。作者指出，中国历代政府实行货币贬值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先用减重的方法铸小钱，再用变相的减重方法铸大钱，最后又用纸币来膨胀。用小钱就是尽量减轻钱的分量，汉初的荚钱和董卓的小钱都是属于这一类。

常有人将通货膨胀归咎于纸币的发行。经济学家本杰明·克莱因就认为，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货币从硬货币向软货币过渡，从而招致了通货膨胀。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股票部副总裁卡比尔·塞加加尔在《货币简史》一书中坦言：“1000 年的货币史留下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教训：当一个大社会由硬货币向软货币过渡、社会的‘超级大脑’开始形成对货币的崭新认识时，这个经济体就会面临失败的风险。”由此，有人主张恢复硬货币，金融作家金森·刘易斯在他的《货币炼金术》一书中就提倡曾否实行和得到贯彻。其实，硬货币也会引起通货膨胀。不过，它引起通货膨胀的伸缩性要比纸币小得多得多。

书中，彭信威的一段话发人深省：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所以制度的研究，自然很重要，可是不应当过分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清末以来，留心货币问题的人，正是犯了这种毛病，他们似乎相信制度万能，以为日本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富强起来，在于变法，在于货币制度好，所以你上一个条陈，我提一个建议。研究货币学和货币史的人，主要就是致力于搜集一些法令和条例，甚至不问这些条例曾否实行和得到贯彻。似乎只要货币单位定得好，货币种类选择得好，就能算是一种好的货币制度。殊不知货币制度的善恶成败，既不在于钱形的美观与否，也不在于单位的大小轻重，而要看货币的购买力能否维持，使其不致搅扰人民的生活。

注：公石为计量单位，一公石等于一百公斤。

把握新基建的“新”“基”“建”——读《新基建：全球大变局下的中国经济新引擎》

◎禾刀

几乎每一次危机，均可能催生新的变革。不过，变革和调整从来不可能是自动的，而是人们努力寻找症结，主动突破的结果。近期出版的《新基建：全球大变局下的中国经济新引擎》认为，必须尽快推动以新的领域、新的地区、新的方式、新的主体和新的内涵等“五新”标志的新基建，以此吸引全球产业链，占据科技创新制高点。

这本由任泽平等等作者联合撰写的新书对新基建的论述全面而具体。通读全书，感觉最突出的还是把握好三个字，即以新领域为牵引龙头的“新”、补齐新领域配套资源的“基”、多措并举筹集资金的“建”。

“新”，就是紧盯引领未来的新引擎。有新基建就有老基建。老基建其实一直在推进，从未中断过，最具代表性的当数 2008 年为应对肇始于华尔街的次贷危机，国家及时启动的 4 万亿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这轮大规模建设，不仅弥补了我国基础设施的短板，还推动高铁基建等行业冲向世界前列，同时也打造了一批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基建狂魔”企业形象。



《新基建：全球大变局下的中国经济新引擎》
任泽平 马家进 连一席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6月出版

虽然传统基建不可能就此戛然而止，但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建设，传统基建投资必将进入一个平稳期。新基建瞄准的则是“未来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在本书的三位作者看来，如果说 20 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指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那么未来 20 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 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创新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

作者在本书中所倡导的“新基建”，并没有与传统基建一刀切地剥离开来。反倒是在他们倡导的新基建方案中，弥补传统基建的短板仍旧不可或缺，毕竟这是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只是，在推进传统基建的同时，更有必要延续发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集中精力和资源，快速构建以“新领域”为龙头的新基建建设模式。这种倡议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基于当前现实条件。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未来衍生出的市场不仅庞大，还可能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打下坚实的基础。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追赶，目前我国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 5G 技术终于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国的移动支付、电子商务、新零售、人工智能、共享出行等技术的发展在全球更是具有引领意义，在新基建环境激励下，未来极可能培育出一批处于世界发展前沿的高精尖企业。

因此，通过顶层设计，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加大对新领域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极可能使我国新领域科技企业实

现快速发展，成长为未来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基，就是压实新领域的软硬根基。新基建既包括传统的“硬”基建，也包括了“软”基建，比如人才培养、医疗体系、政策配套等。与传统基建投资对经济拉动影响具有短、平、快特征不同的是，新基建的投资时间往往更长，比如教育投资，在短期内就很难看出效果，因此需要坚定信念和政策的长期激励，持之以恒。

新基建在资源配置方面也不可能做到平均分布。如果对有限资源进行科学排序的话，在新基建板块中，新领域当仁不让排在决策核心位置。本书给了两条基本思路可供参考，即“从需求看，新基建应更好地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从生产看，新基建需要为中国创新发展、绿色环保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创造基础条件”。有利于刺激需求，有助于刺激生产，这才是新基建顺应市场规律的根本。

需要警惕的是，新基建不是一个筐，不是什么都能往里装。在作者看来，新基建尽管没有彻底摒弃传统基建内容，但新基建不能穿新鞋走老路。新基建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但这种打基础不是以传统的“铁公基”为主要代表，而是以新领域为中心。

新领域不同于传统领域之处还在于，新领域的人才门槛和经济门槛更高。作者在本书中指出，从 1978 年到 2018 年的 40 年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 1.7 亿快速增至 8.3 亿，人口净增 6.6 亿；城市化率从 17.9% 提升至 59.6%。按照作者的估计，未来中国有望形成 10 个以上常住人口 1000 万级城市和 12 个以上常住人口 2000 万级大都市圈。需要说明的是，上榜城市和大都市圈中，科技实力更强、经济基础更好的东部沿海城市占绝大多数。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本来就具有优势，再考虑到人才水平等因素，更有利于助推新领域企业快速发展，因而这些城市和城市圈可能首先成为新基建的投资“热土”。

作者在极力倡导新基建的同时，也担心一些地方头脑发热，一哄而上。虽然新基建也兼顾了公平和效率等问题，但新基建中的许多内容要求极高，不能贪多求快，更不是靠砸钱就能收到理想效果。事实上，越是高科技行业，越是需要人才和技术的长期积累。新基建重点是补齐高新领域的资源配置短板，为智力聚集“蝶变”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建，就是多方出击筹措建设资金。新基建当然离不开庞大资金配置。对此，本书的建议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优化减税降费、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改革财政体制等。后面四条大家并不陌生，争议最多的往往在于扩大财政赤字这一条。

为突破资金瓶颈，作者认为，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这句话说得更直白些，就是要算大账、算长远账。当然这也对资金投向的科学性、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竟只有这样，预期收益才可能大概率真正转化为现实。

资金问题确实非常重要，不过依笔者拙见，新基建的最大困难可能在于人才。尤其是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人才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和迫切。总而言之，在推进新基建建设的宏大历史叙事中，我们不能因为任何一个“短板”，而不得不放慢自己的脚步。因此，如何抓紧突破人才瓶颈，很可能是新基建中的重中之重。

■披沙录



《增长的悖论：
全球经济中的创造者与攫取者》
(英)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著
何文忠 周璐莹 李宇鑫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5月出版

驱动经济良性增长的是价值创造活动而非价值攫取，但在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中，攫取者所获得的回报却长期高于创造者。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一个巨大的隐形悖论，也是经济增长乏力、创新受挫，以及一切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马祖卡托深入钻研了过去 300 年间经济学界对价值的相关思考，并梳理了现代经济中丰富的产业故事。在本书中，作者将以全新的视角，带领读者重新反思什么是价值？如何界定创造者与攫取者？增长从何而来？创新如何引导？政府和企业如何协作才能促进增长，共同创造出公平、普惠和充满活力的新经济？作者认为，我们必须回归源头，重新定义价值，以便区分创造者和攫取者，并对经济活动加以引导，激活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那些比答案
更重要的好问题》
湛庐文化 编著
湛庐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
2020年6月出版

人的智能如何与越来越强的机器无限连接？古 DNA 如何揭示人类起源的秘密？我们真的可以“复活”已经灭绝的猛犸象吗？脑机接口会让人类掌控自我的进化吗？未来的创新为什么必须重视混流？……对于未来，我们无法预知答案，但是却可以看见它涌现的端倪。正是缘于这个朴素的出发点，《那些比答案更重要的好问题》将用 14 个“思想之问”开启一场思想者的探索之旅。在本书中，读者将与汪小帆、周涛、宋继强、洪波等 14 位国内顶级科学家、思想家、趋势专家，一起走进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认知科学等科技前沿领域，共同探索思想的边界，探究未来的 14 种可能。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
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著
刘斌 刘一鸣 刘鹰牧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年6月出版

《美国真相》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最新著作。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当前发生的这一切绝非偶然，在其强盛的光环背后，经济、贸易、政治早已布下重重阴影，其深层次的美式资本主义体制问题，才是造成今天这一切的元凶。1943 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新斯蒂格利茨，先后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于 1979 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2001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7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美国真相》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剖析美国问题，揭露美式资本主义隐藏的制度危机，还原美国真相，简明而深刻地揭示了美国面临的巨大问题和危机，为读者看清当前美国乱局的真相，提供了注解。



《华为全球化》
陈肇峰 著
蓝狮子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出版

本书的作者陈肇峰亲历了华为 13 年的国际化历程。作者先后供职于华为在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智利等国的公司，是华为欧洲总部平台的搭建人，并曾担任华为智利副代表。作为全球化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华为的总营收中接近一半来自海外市场；华为在全球有近 20 万名员工，服务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本地化率达到了 75%。本书的作者有着丰富的跨国文化管理经验，在华为工作期间，获得了华为“天道酬勤”“个人金牌”等多枚公司级金牌。在本书中，作者详细叙述了华为进入海外市场的过程和理念，并以参与过的华为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剖析华为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为有出海意愿的中国企业提供出海及在海外可持续经营的建议。